

农村“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基于六盘水的地方性实践^{*1}

张绪清

(六盘水师范学院, 贵州六盘水 553004)

【摘要】: 乌蒙山区腹地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与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从价值蕴意和实践内涵上看,“三变”改革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积极改善和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推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地方性实践能够成为一个开放性经验,主要在于改革坚持了五大原则、“五个文明”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的辩证统一;强化顶层设计、转变治理理念、优化制度衔接,以及强化理论与实践研究,则为精准扶贫深度推进提供了可行方案。

【关键词】: “三变”改革;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7)01-0089-11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与农村综合改革进入“攻坚区”与“深水区”,落后的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农村社会建设滞后、贫富差距扩大化趋势增强与贫困问题叠加,严重制约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这就亟需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从根本上变革生产方式,从而积极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在新一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六盘水市,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性地提出了旨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三变”改革模式,以科学的举措积极响应国家减贫战略调整,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因此,积极深化“三变”改革研究,具有深层次的价值意涵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引出

2014 年以来,六盘水探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三变”改革,这一旨在撬动农村闲置资源资产、盘活国家政策与资金、转化农民观念与职业身份的探索实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学界以敏锐的眼光对农村改革这一焦点问题予以了理性思考和深入探讨,理论热度伴随实践强度不断升温。专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改革实践者一道,试图从产权视角协同推进改革。

六盘水“以‘三变’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效激活了包括集体土地、山林、厂房等‘沉睡的资产’,不仅找到了农

¹ 收稿日期: 2016 — 11 — 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乌蒙山国家能矿基地扶贫开发问题研究”(12XJL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绪清(1977 —), 贵州镇远人, 六盘水师范学院副教授, “三变”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乌蒙山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 贫困与区域发展、“三变”改革、能矿基地发展。

民增收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欠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1]，有效地加快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激活各类生产要素，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创新了农业生产经营机制，实现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拓宽了农民增收路径。”^[2]既有政策框架下界定的农地产权，随着实践深入亟需再造微观经济基础，方能维护农民利益不受损，积极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施土地确权后，“产权对价”机制是农户资源性资产保值增值的终极激励方式，并且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理论逻辑与实践基础，所以说，“生产农户财产性权利的相对价格形成机制，是扩大农业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积累唯一正确的激励机制和效率基础。”^[3]然而，六盘水“三变”作为农村发展关键节点的重要探索，实质上是以产权为纽带，为农村资源资产资金的规模聚集、治理改进和效率提升^[4]找到了一条合理路径。在不改变土地性质、坚持农村经济基本制度基础上，“通过折价入股解决资源性资产创收问题，通过整合财政资金实现规模效益，以入股代替租赁，分享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成果”^[5]。同时，引入新型经营主体有效地弥补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能力薄弱的问题，而构建股权交易流转平台与股权退出机制，通过还能赋权进一步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三变”改革的产权明晰化，围绕产权财富化这一核心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经验，不仅可以推广到条件相当的欠发达地区，其精髓也可以为发达地区所借鉴。”^[6]“三变”激活“三资”^[7]，为农村产权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8]。

可以说，一些贫困地区农村落入“扶贫—脱贫—再返贫”发展陷阱，单纯依赖传统单一的制度供给根本无法实现正常减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客观上亟需国家减贫战略调整与政策创新。在一些地区农村深化改革无法破冰，甚至停滞不前的情势下，六盘水“三变”改革在贫困面广、程度深以及贫困效应强烈的“问题区域”通过创新实践取得较好政策效果。在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资金短缺、经营主体不完善的情况下，以制度创新为基础，吸引外来投资，点燃了农民干事创业的激情，激活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生机与活力。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改变农民思想观念，为农民精准脱贫找到了一条科学路径。通过调整减贫方式、变革减贫方法，在政策驱动与市场拉动双向互推格局中有效地促进了贫困治理转型。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护和发展农民合法权益基础上实施“三变”改革，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实践样本借鉴。

六盘水“三变”改革自诞生之日起，尽管学界对这一地方性实践付诸了高度关注与热烈探讨，但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改革的价值意涵、主要内容、风险防控、成效肯定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已有研究成果中，关于此项改革的断面与个案研究较多，系统与综合研究较少，至于国内外的系统性比较研究尚未发现。从文献载体呈现上，更多成果集中于报纸与网络传播，而专著与高水平期刊文献少。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朝纵深方向演进，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将此类地方性实践由经验上升为理论，将扎根中国大地的本土实践进行科学系统的概括、提炼和总结，最终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二、典型案例:六盘水市的农村“三变”改革

六盘水市地处贵州西部，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腹地，是国家扶贫攻坚与决战贫困的“上甘岭”。全市4个县(特区)区，六枝特区、盘县和水城县3个属于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钟山区属于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区域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返贫效应强烈，截至目前，全市农村依然有41.65万贫困人口尚未脱贫，贫困人口居全省第7位;贫困发生率15.67%，远高于全省14.3%的平均水平，位居全省第4。在615个贫困村中，极贫乡(镇)扶贫任务异常艰巨^②。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决策部署，确保贫困地区、贫困农民在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早在2014年，六盘水市委、市政府就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精神，以及贵州省委关于脱贫发展新阶段的战略思想和具体要求，结合地方实情制订了“决战三年·摆脱贫困”的战略部署，并明确提出:坚持在党的领导与政府主导下，以企业为龙头，产业为平台，股权为纽带，人民为主体，全面小康为目标，实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通

² ①数据来源:2016年10月17日，六盘水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我国第三个国家“扶贫日”向全市发布的扶贫倡议书所提供的资料整理。

过土地流转、资源整合、百姓参与以及搭建发展平台，六盘水市委、市政府创造性地提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有效地调整和完善了农村生产关系，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充分释放了农村长期沉睡的闲置资源和自然资源，有效地破解了一直困扰农村发展的“三农”问题。这一创新性实践探索为西部贫困山区的农村精准脱贫，乃至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开放性经验。

（一）“三变”改革缘起与基本内容

1. 改革背景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三期叠加”，新常态发展不断走向深化。长期“吃煤饭”“念煤经”，严重依赖煤炭经济为支柱产业发展的煤城六盘水，在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双重压力下，被迫做出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根据第一产业长期发展失衡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决定按照“一产升级、二产转型、三产优化”的思路积极响应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这不仅是通过创新思维主动谋变与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的问题，更是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全面小康与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农村发展弱质化、集体产权虚置化、农民生计贫困化，以及乡村社会“空心化”“荒漠化”问题日益突显。历时性矛盾发生共时性承受，“三农”问题、脱贫攻坚与科学发展问题的解决面临新的挑战。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农业经营体制遭遇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农村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经过30多年的实践，改革红利与政策红利在市场经济不断高度化进程中几乎消失殆尽。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分”得充分与相对彻底，却出现“统”得松散与严重不够的问题。尽管已实现农民温饱问题解决、单个农户理性经营生产与个体经济精细化发展，但农村集体经济与经营组织的松散，导致农村经济严重弱质化与产权虚置化。特别是农村资源的闲散化、资金的分散化与土地的碎片化经营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现代农业发展。过于分散化的资源、资金和资产，难以适应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运营。

第二，农村发展机制遭遇新挑战。长期以来，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和重工业的一系列战略实践，无形中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特别是在政策、资金以及物质配套上的失衡，强化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异质性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经济效益和现代生活方式，无形中激励和吸引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精英群体快速流入城镇，贫困地区的农村发展迅速失去生机与活力，加剧了农村社会“空心化”与“荒漠化”。因此，新形势下亟需国家采取科学的体制机制，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如何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与市场红利，成为深化改革必须解答的重大课题。

第三，脱贫攻坚遭遇新挑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扶贫主要通过运动式扶贫模式展开，更多地注重暂时性贫困问题解决以及任务性目标完成。内生性扶贫、社会网络支持、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动员机制等制度性扶贫机制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脱贫攻坚中“政府热、社会弱、民间冷”的问题不断出现。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逐步由发展带动减贫时代进入减贫左右发展的新时代。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对减贫的带动作用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萎缩、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黄金条件恶化而趋于减弱；另一方面，贫困结构性与贫困泛政治化的压力明显增大^[9]。精准扶贫机制缺位与制度欠缺，造成了农村“扶贫扶富”的诡异，突出表现为：农民有资源没资产、有权利没利益，农村有资源无市场，农业有空间无效益，农业经济社会弱质低效运转。

第四，乡村建设与反贫主体严重缺位。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首要任务是必须打赢扶贫攻坚战，建成农村全面小康。在扶贫攻坚划定时间表和启动问责制背景下，部分地区扶贫干部为完成既定任务“急得要死”；部分贫困群众认为扶贫是政府的事情，认识不到位抑或认识偏差，对扶贫工作“死也不急”，出现了“上热下冷”的扶贫尴尬。这源于扶贫缺乏内生性动力支撑体系与逻辑转换机制，也是长期以来对农民利益和权利被代表、被忽视造成乡村建设主体性缺位的后果。加上农村精英群体整体性逃离，严重阻碍了反贫减贫工作开展。如何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获得感与安全感，已经成为考量政府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与真正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现实难题。同时，这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

有鉴于此，六盘水市根据全面小康的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提出 40 万贫困人口在 2018 年实现全面脱贫。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三农”思想与“民生本位”思想基础上，根据省委提的：“保障和实现农村承包地等合法权益、探索财政和扶贫资金股份化运作模式”等指示，科学开展“四找”（找问题、找差距、找目标、找路径）活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按照“转变思想观念、转变脱贫路径、转变干部作风”的工作要求，谋求科学脱贫发展。积极借鉴“三转”工作理念、路径和方法，经过深入调研，实践探索、总结提炼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并提出农村“三变”改革实践。

2. 基本内容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提出的“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的要求，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做到并实现“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六盘水市积极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其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资源变资产。从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整合农村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劳动力资源等，采取存量折股、增量配股、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推动农村资产股份化、土地资源股权化，盘活各种资源要素，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聚合，并形成叠加效应，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具体讲，就是将农村集体的土地、林地、水域、荒山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存量资本等要素，通过一种股权的方式入股企业或经营主体进行盘活，变“死资源”为“活资产”，变“黑资源”为“绿资源”，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第二，资金变股金。采取集中投入、产业带动、社会参与、农民受益的方式，将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农村经济加快发展。具体讲，就是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将村集体资金、农民分散资金和社会资金以及各级财政投入到农业发展类、扶持类资金等，通过科学地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的股金，投入各类经营主体并享有股权收益。

第三，农民变股东。坚持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把生态做成产业，把产业做成生态，让农民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让资金在市场中流动起来，有效地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具体讲，就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让农民自愿将个人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等发展要素，入股到农业经营主体成为股东，最终参与企业分红。再通过把农民的资产，包括自然风光、名树、古屋、民族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作为资产折价入股经营实体成为股东。

通过资源变资产，改变资源型城市傻大黑粗煤炭经济的外在形象；通过生态保护，“黑”资源变“绿”资源；借助气候资源优势，让“冷”资源变成避暑旅游“热”资源。数据显示：仅 2016 上半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062.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5%；旅游总收入 64.31 亿元，同比增长 75.9%^③。“通过资源变股权，让沉睡资源活起来。从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手，采取存量折股、增量配股等形式，推动农村资产股份化、土地股权化。资金变股金，让分散资金聚起来。采取集中投入、产业带动、农民受益等方式，实现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④通过创新实践，存量资产转变为流动资本；把分散资金集中起来投入产业园区，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通过农民变股东，农民与第三产业有效链接，实现联产联业、联股联心。特别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企业不仅可以参与分红，而且还可以进入农业产业园区就近务工就业，地道的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可以说，农民变股东，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变为现代产业工人与股东，实现角色和身份的双重转化，加速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跃迁。在“坚持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前提下，开展改革探索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⑤“两年多来，全市共整合 45 万亩集体土地、119 万亩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经营主体，整合各类资金 51 亿元集中投入 645 个产业平台，发展特色产业 427 万亩，入股农民达到 38 万户 126 万人，其中贫困群众 10 万户 32 万人，带动了 22 万贫困群众脱贫。”^⑥

³ ①为推进“三变”改革，六盘水市围绕“中国凉都”品牌，着力高端定位与科学规划山地旅游、乡村旅游以及民族风情旅游等精品旅游线，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据来源于，2016 年 7 月底在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调研；另外，还得知全市已有 39 个旅游项目列入 2016 年全市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名单，4 个旅游项目入选“2016 全国优先旅游项目名录”。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原则

1. 指导思想

六盘水“三变”改革，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以科学理论指导，保障弱势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有效实践。理论支撑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实践指导上，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寻求科学发展新突破。改革效果上，有力地回答先富与后富以及共同富裕的问题。总体上看，“三变”改革是主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又一典范。“从哲学的角度对我市农村‘三变’改革予以分析、解读，进一步揭示农村改革的哲学基础、现实逻辑、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努力在整体上为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思路与路径提供理论支撑。”^[13]

为何实施“三变”，既是一个理论性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早在1990年，邓小平对农业发展问题就曾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4]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释放了农村闲置的自然资源、剩余劳动力，有效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与内在潜力，实现了绝大多数贫困农民脱贫发展。这一改革在当时使得过度集中的农村集体资源、资金、资产，以及技术、组织结构迅速瓦解，集体经济发展要素分得充分，无形中削弱了农村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实力，造成村集体严重虚置化与农村社会内部分化，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弱质化的逻辑起点。

2. 实践原则

从实践成效上看，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之所以得以顺利推进主要在于做到了五个坚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推进知行合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优化发展路径；坚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坚持改革于法有据，促进社会公平与价值正义；坚持把维护和落实群众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问计于民积极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具体讲体现如下：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产业，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第二，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直面问题而不回避问题，在探索中找准问题着力从多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同时，对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进行积极及时的总结，以进一步检验制度设计、优化脱贫发展路径。

第三，始终坚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注重发展速度与质量提升，一是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扎实推进“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实施“3155”工程按照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路径，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二是出台了“决战三年摆脱贫困”的战略方案，坚持当下脱贫与全面小康、当前发展未来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等目标的辩证统一。既注重解决2018年全市人民的全面脱贫，又着眼于脱贫后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第四，始终坚持依法改革，做到于法有据。诸如依法进行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依法规范农村产权的交易市场，依法规范农民的合同管理，依法规范经营权和承包权所谓的“两权”抵押等工作。此外，在全市还专门成立“三变”改革办公室以保护和规范合同管理，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

第五，始终坚持在民生本位思想中间计于民，始终坚持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不动摇。同时，积极注重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改革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防控，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另外，政府还高度重视“三变”改革中的青年参与。一是政府给予大量资金帮扶和投入情感培育，引导和鼓励青年、大学

生、返乡创业青年参与“三变”。二是通过政策引导和组织，吸引在外人员返乡建功立业，发挥优秀青年在扶贫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作用。思想上，通过典型事例激发青年人主动参与脱贫的决心与干事创业的激情，引导他们投身“三变”改革实践。组织上，注重发挥共青团组织的引领作用。借助六盘水作为国家创业型试点城市建设载体，在产业链上建立团支部，凝聚青年力量合力推进扶贫攻坚。截至2016年5月，全市共建立914个产业团支部带头创新创业。其中，116万农民变成股东，36.6万青年占31.55%。在645个产业平台中，487名青年是产业平台的企业家和董事长，占总数的75.5%。参与平台入股的29万农民中，8.4万属于青年^④。

三、农村“三变”：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意涵

“三变”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场内生性伟大改革实践，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精准扶贫与生产方式变革。“三变”之所以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吸引社会关注和媒体聚焦，关键在于它预示着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发展方向。究其改革本身而言，蕴含着如下内容：其一，“三变”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相同；其二，“三变”改革切中“三农”问题要害；其三，“三变”改革为传统乡村社会注入生机活力；其四，“三变”改革夯实农村经济基础，巩固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地位。

（一）“三变”改革是中国农村又一次新的革命

千百年来，土地一直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不仅在于土地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来源，更在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为农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自新中国建国后的半个世纪来，围绕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问题上的改革实践，仔细梳理后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解放前的解放区土地改革实践。当时针对中国不到10%的富农掌握了90%土地的实际状况，90%的农民使用不到10%的耕地问题展开^⑤。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当家做主，确保千百年来农民的夙愿，实现“耕者有其田”，成为当时改革的基本动力和逻辑起点。

第二阶段，发生在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期间，在城市，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工商资本、建立公有制经济；在农村，尝试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生产资料集中起来，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变成集体经济。改造完成后，客观上忽视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基础，忽视生产资料与人的积极性矛盾，忽视生产关系中个体利益最大化实现，因而，人民公社化形式和实质上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第三阶段，是1978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30多年实践，农村集体经济最初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发生异化，突出问题表现为集体经济“分”得彻底，“统”得不够，整体经济严重弱质发展。一家一户分散化经营与精细化耕作模式在解决吃饱穿暖后，无法解决农村集体抑或整体富起来、强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同时，基于各种因素无形中衍生新的问题与矛盾。包括分散化的小农生产方式无法带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无法通过规模和范围扩大，增强竞争力与效益提升的深层次问题。在此情况下，六盘水“三变”改革不仅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而且通过“农民变股东”实现农民整体性脱贫，这无不预示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新的一个起点到来。第四阶段，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变”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地方探索，通过规模经济提高效益，释放了农村大量闲置的自然、生态、经济以及旅游等资源，以及过去处处存在却视而不见的人文资源。通过一种新的财产组织形式，赋权农民将农村闲散的资源重新进行市场定价，积极把资源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从价值层面实现资源资本化与资本资源化最佳融合发展。

⁴ ①2016年7月7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年年会“青年·生态·扶贫——‘三变’改革中的青春力量”主题论坛在六盘水市召开。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共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通同志以六盘水市“三变”改革为样本，深入剖析青年、生态、扶贫与改革关系进行的主题发言录音资料整理。

⁵ ②数据来源：根据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年年会“青年·生态·扶贫——‘三变’改革中的青春力量”主题论坛，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宝江教授的主题发言录音整理。

(二) 调整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六盘水探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三变”改革，这一地方性实践与中央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6年，中央为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实上，供给侧改革根本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点在于改革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等各种关系，以提高和增强制度的有效供给，以及改革效度与质量提升。从供给侧实施改革，既是对全国宏观经济发展提出的现实回应，也是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30多年前，国家在农村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地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单个农民的理性经营和精益生产。随着改革实践深入推进，过于分散化的个体经营与整个社会化无序生产造成农产品相对过剩，增产不增收现象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很长时间内，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在制度供给不足情况下，分散化的个体农户根本不可能解决双层经营体制中统分结合的问题，也根本无法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当前，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农产品附加值普遍较低、产业链条较短以及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使得“三农”问题异常突显。农业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从供给侧变革现有生产关系与经营体制迫在眉睫。

从生产关系视角看，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农民“带资进城”，促进了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产权制度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巩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农村“三变”改革有效提供制度供给与生产变革方式，盘活了现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土地、自然山水和绿色生态等资源，最大化地释放经济潜能，使其带来的福祉泽及全体农民，乃至全体国民都是可行的。

(三) 夯实农村经济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实质上，贫困农村之所以变成“问题区域”，关键在于缺乏强大的集体经济做支撑。分散化的单个农民根本无力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贫困农民只好依赖于国家的政策与制度供给，这才导致农村建设滞后、农民社会组织衰退，以及农村社会“空心化”问题出现。可以说，农村衰败景象与农村集体经济减弱的镜像不无紧密关联。而“三变”改革创新实践，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抓住了农村发展之根本，为未来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理论操作统建与实践物质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配给制、“输血式”，以及“大水漫灌”的运动式扶贫，不仅没有实现整体性脱贫，反而强化了农村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在忽视农民个体性差异，社会资源获得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下，处于社会底层末端的弱势群体根本无法依靠自身努力实现正常脱贫。基于各种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最弱势、最困难、最需帮扶的贫困群体得不到及时帮扶与救助，处于被扶贫和边缘化状态，出现“越扶越贫”的窘态。而“三变”改革突出特点就在于精准。创新扶贫模式，以“造血式”取代“输血式”，精准锁定贫困群体、精准找准产业，以产业带动和主体参与融合发展，为破解“三农”问题找到突破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源于：

第一，以公有集体资源参股企业发展，将政策性扶贫资金投入经营实体平台，农民成为企业股东参与保底分红实现包容性发展。“通过增加农民的租金收入、股份分红收入、转移就业后的收入、自营工商业收入以及种植业收入等分别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工资性以及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1]

第二，“三变”改革将集体产权以股份化运作方式盘活资产。不仅实现土地、劳动力等发展要素市场化，激发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与经济效益，而且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直接实现自然资源的价值增值。

第三，破解集体经济长期虚置化和缺位难题，补齐农村集体产权缺失造成利益流失的短板。借助政府于市场的两种力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基本服务供给，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繁荣稳定。

第四，从表面上看，“三变”改革最初仅着眼于“三农”问题解决与贫困缓解。随着实践深入和正能量释放，实质上“三变”不仅为建设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五个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为“包容、创新、绿色、协调、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找到了一个最佳契合点。

(四)破解农村治理困局，具有开拓性的价值意义

大规模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驱动下，农村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出超过流入，农村精英流失不断加剧乡村衰败和“空心化”。“三变”改革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以其优势潜力、就业创业、增值空间吸引和留住农村精英，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农村社会分化，增强了社会治理能力。价值效用如下：

首先，有效阻止农村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外出务工，进入城市抛弃家园而留守城镇。偏远山区农村，留下一大批走不出更走不动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即所谓的“三留人员”。不仅成为社会建设负担和风险策源地，而且成为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发展的短板，也就是说单靠他们的能力根本无法实现脱贫。

其次，扭转农村社会紊乱的秩序。目前，大多数农村党支部依然处于混乱、分散、软弱状态，传统农村规范“失序”与社会风险增加，偏远地区更成为犯罪多发、高发的“重灾区”。缺乏农村精英群体与乡贤参与，提高农村治理能力与建构和谐社会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精英群体回流并转化为职业农民，特别是村官职业化发展趋势与未来建构，又为农村发展、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党在农村的基层执政基础，并赢得老百姓的普遍认可。

最后，有效阻断农业社会“荒漠化”扩大。农村环境保护意识个体理性中更多地夹杂着极端的私利，个体理性与整个乡村社会的无序化存在，导致脏乱差与“公地悲剧”频繁发生。“三变”改革不仅有效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还在于积极改善了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为消除“空壳村”提供了现实摹本，不仅加快了美丽乡村建设，而且为留住“乡愁”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开放经验。

四、研究结论及未来思考

六盘水“三变”改革既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种典范，也是绿色发展的一次重大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值得深究的活态样本。“三变”改革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次农村生产关系的主动完善和及时调整，为破解“三农”问题从精准扶贫的视角打开了改革的一个窗口。可以说，“三变”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从价值效用上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三变”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三农”思想的生动实践，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理论创新，是主动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又一实践成果。“三变”有效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府与市场、农民与企业，企业与村集体以及主观与客观的内在同一与辩证统一。

第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站在“五位一体”的角度总体布局，从“四个全面”战略高度自觉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市场配置、人民主体，强化顶层设计与理论指导，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民生思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地回答“三变”如何实现统分结合、先富与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有效处理了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目标与路径、股份制与合作制、村支两委与合作社等“五大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运用市场手段推进改革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增值。通过一系列改革，推动经济组织化、

规模化、市场化，形成六盘水农村发展的新模式。

第四，“三变”作为一个成长发育型的新生事物。这一地方性实践有力地推动农民脱贫，实现弱势群体包容性发展，从而解决实施精准扶贫之前，农村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和“被脱贫”的问题。农村“三变”改革使农村脱贫逐渐从行政推动走向制度内涵推动，实现农业与农村再发展。通过借助外力走向内生性扶贫和社会网络支持扶贫，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充分肯定，为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深化改革中，“三变”这一地方性探索亟需通过以摸石头、找规律的方式，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指导改革实践。既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系统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又要认识到改革的必然性、建设性和实践性长期并存；同时，还要从改革力度、实践深度、战略高度、范围广度以及价值效度等方面加以综合考量。改革成效上讲，实践模式的最终定论与实践经验全面推广尽管为时尚早，但从改革性质、主要内容、价值意涵以及成效而言，其改革价值与正能量释放引起了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进一步赋予了改革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委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无形中赋予了改革以理论与实践意义。即便如此，“三变”探索实践目前依然处于快速成长发育阶段。深化改革亟需积极回应世情、国情、省情变化，立足六盘水、跳出六盘水、发展六盘水，以更宽阔的视阈、更长远的眼光科学地推进“三变”改革。亟需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鉴于改革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涵，很有必要将这一地方性探索从理论与实践上升到国家改革的战略层面。

其次，“三变”改革作为一个活态样本，亟需纳入中国历史与世界农业发展的坐标体系加以综合考量。从世界农耕文明与人类发展轨迹中，为改革发展提供实践参考和有益借鉴。针对改革风险的隐患问题存在，亟需尽快建立改革的风险防控和预警机制，尽量减少和降低改革发展成本。

最后，强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深化“三变”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在实践中形成并上升为科学理论努力。在后改革时代，如何放大“三变”并形成“三变+N”的改革模式，弘扬“三线”精神、深化“三变”改革，打造城乡统筹改革发展先行市，改革路上依然期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孔祥智，穆娜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以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为例[J]. 新疆农垦经济, 2016(6):1—11.

[2] 中央党校农村改革调查课题组.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探索——贵州六盘水市“三变”改革工作调查[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6(11):87—91.

[3] 陈家泽. 产权对价与资本形成: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创新——以成都实验区为例[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6(4):98—110.

[4] 叶兴庆. 以产权制度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六盘水市“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调查[G]//中共六盘水市委,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 六盘水“三变”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探索.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23—33.

[5] 郭沛. 贵州省六盘水市“三变”的基本经验、面临的挑战和相关建议[G]//中共六盘水市委,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主编. 六盘水“三变”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探索.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65—72.

[6] 孔祥智. “三变”改革与中国农村发展之路 [G] //中共六盘水市委,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 六盘水“三变”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探索.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73—81.

[7] 周建华. “三变”激活“三资”——六盘水市创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G] //中共六盘水市委,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 六盘水“三变”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探索.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83—91.

[8] 六盘水“三变”指明农村产权改革大方向 [J]. 领导决策信息, 2015(40):22—23.

[9] 陆汉文, 黄承伟. 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6):精准扶贫战略与政策体系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0] 万秀斌, 汪志球, 郝迎灿. 六盘水:农村三变效益自见 [N]. 人民日报, 2012—12—21(01).

[11] 刘远坤. 农村“三变”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J]. 行政管理改革, 2016(1):29—32.

[12] 陈屏. 凉都, 一片绿色热土——“青年·生态·扶贫——‘三变’改革中的青春力量”主题论坛综述 [N]. 六盘水日报, 2016—07—10(01).

[13] 李再勇. “三变”:深化农村改革的哲学实践与思考 [N]. 六盘水日报, 2016—01—25(01)(02).

[1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55.